

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两篇不谋而合的文章。

一篇是配音艺术家童自荣写的《老厂长,你知道我们在想你吗》。我揣测原标题中是“陈老头”,因为在文中,童自荣直呼陈叙一为“陈老头”,最后的点睛之笔,正是这一句:陈老头,你知道我们在想你吗?陈叙一被叫做“老头”时,大约是60多岁,一点也不老。他接受“老头”的绰号,是欣然其美意。唯有他这样的“老领导”,才有幸获得如此待遇。

还有一位老领导是在《如何成为陈冲》中见到的。陈冲父亲陈星荣,曾经是华山医院院长。他的学生李克教授很是动情回忆道:“有一年春节,上海极冷,华山医院的水管都

爆裂了。一清早,老院长就提着小酒赶到医院慰问,冰天雪地里,一直陪着工人们干活。”陈院长亲自去慰问,还“提着酒,冰天雪地里,一直陪着工人们干活”。远远超出了院长的职责范围,却是带着父母式的疼爱,带着人文关怀的高度。

“老”并非年长,而是做一方领导久长。老领导是怎么一种角色?《礼记·大学》的定义大约是最早的:“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,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

最基本的老领导,大多长于兹,官于兹,也终老于兹,有对家乡风土人情的通透,有对家乡是是非

非的熟知和判断,有对家乡“本位主义”的护卫。犹如《白鹿原》的白嘉轩,他是族长,是白鹿原的老领导。

老领导

马尚龙

上海的历史,决定了老领导不可能是传统的本地人,但是,上海一直不缺少老领导。他们长久在某个领域、某个单位供职以至为官,通晓管辖之地的专业,通晓管辖之地的人情世故,父母式的感受,油然而生。

1980年代,我去译文出版社拜访一位前辈,是夏天,很热。前辈从冰箱里拿了雪糕招待我。单位怎么会有冰箱?我惊奇。前辈告诉我,是阿拉社长骆兆添私人出钱买的。译文出版社成就累累,小洋房办公室却是暑气回旋。骆社长提议买个冰箱,但是冰箱属于“政府控制购买产品”,出版社不具备购买资格。骆社长心生一计:我个人出钱买,放在出版社让大家用,不违反政策吧?当时冰箱是奢侈品,不仅很贵,还需要侨汇券。骆社长就这样私物公用了。

骆兆添社长和陈星荣院长是同一个风格的老领导。按照年份和社会阅历

推算,或许他们还认识,甚至是朋友。

从老头,老院长,老社长,是否可以联想到更多的“老字号”领导?老校长,老主任,老所长,老书记……老领导是叫得出部下名字的人,是在食堂大厅里与同事同桌吃饭的人,可以一起聊聊家常开玩笑。这种相熟,是依凭了经年累月的共处,酿造出来的葡萄酒,而不是浅尝辄止的葡萄汁。

已故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,也是老领导。

每次去复旦,谢希德是和教师一起坐校车的。谢希德说,坐校车既可以处理一些公事,又可以听听教师们有关学校、社会和自己的所思所虑。到了复旦,谢希德先到物理楼研究室,再步行到校长办公室。有教师把房门拦住,要和校长谈谈分房子、评职称的事。也多有学生向校长致意,谢希德会问学生是哪个系,然后如数家珍般告诉学生,你们系里哪几位教授有哪些研究成果……

这些部下非老领导的心腹,更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。只是对这些部下的人品、能力还有诉求,老领导了然于心,他们是最需要依赖的工作骨干:靠老法师出主意,靠老实人做生活。

也是因和部下共处长久,老领导看人的“辨识度”会高一点。老法师,老实人,小滑头,抬轿子,得意,委屈……这个江湖的深浅,里之所好所恶,老领导心里很明白。

上海被公认具有领头羊的气质,但是从一个团队角度来看老领导的角色,他们更像是狮群中的狮王,对管辖之地有统治力,亲和力,更有保卫和扩大领地的战斗力,如彼时译制片厂、译文出版社……领头羊指的是上海人的群体人文品质,狮王则是团队中领导的力量和担责。老领导既是领头羊,也是狮王。不矛盾。

(中国画) 周小林



丁悚先生是上世纪活跃在上海文艺界的一代名流,日前有幸拜读其文孙所编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,书中收录几百篇丁悚前辈的回忆文章,其中不乏南社社友,如刘海粟、周瘦鹃、陈蝶仙等,读后倍感亲切。

丁悚与刘海粟是同学,皆出于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习场所徐家汇画馆老画师周湘之门。上世纪二十年代两人一直活跃在当时上海美术界的核心。《四十年艺坛回忆录》中有近十篇是关于天马会的。天马会是二十年代上海画坛活动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美术社团,其成员除刘、丁外,还有汪亚尘、钱瘦铁、费龙丁等一大批当时上海画坛的中坚力量。丁悚是天马会的发起人之一,“天马会”其名即由丁悚主张,他在《天马会之诞生与湮灭》一文中说道:“最后我主张不如用‘天马’两字,较有意义,因为‘天马行空’,极切艺术崇高的意思”,而刘海粟和丁悚自己在艺术的创作上又何尝不是以此信念为信念呢?丁悚在《艺术叛徒》一文中说刘海粟:“他自信力特强,一切不肯人云亦云,生平对于作品,力主创造。”

出生于1894年的周瘦鹃比丁悚小三岁,早年曾同为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撰稿。周本人还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,不过他老人家自己并不认可,自称是“十足、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”,他的作品也多发布于代表杂志《礼拜六》,数量达八九十篇之多。创办《礼拜六》本就是周瘦鹃的主意,1914年他由美国的《礼拜六晚邮报》得到启发,没想到出版后大受欢迎,第一期销量就达二万以上。《礼拜六》创刊时由周瘦鹃与同为南社社友的王钝根轮流编辑,丁悚则常为《礼拜六》画封面,通常以传统仕女图或花草图案为题材,落款为“悚”者皆为丁悚作品。他设计的封面既不俗气,也无匠气,非常难得,为杂志吸引了不少读者。在《礼拜六》,周瘦鹃、丁悚、陈小蝶等几个年轻人特别投契,工余他们常在中华图书馆编辑部聚会,还一起去虹口看电影看戏。

写作,丁悚是自学成才的。当年在文人中时兴一种写小说接龙的游戏,周瘦鹃曾主动与丁悚合作过一篇小说《情天不老》发表在《礼拜六》上。这是篇言情小说,讲述中国青年陈国柱和英国少女茜丽霞之间曲折而美好的爱情故事。周瘦鹃铺垫了前半篇,丁悚续的后篇。周氏一向以悲情小说著称,竟能为丁悚委曲求全,成就一篇大团圆结局的小说,着实可见二人之情谊。

丁悚文才不弱,他有首《长相思》:“才花残,又月弯,偏是良人去不还,许多相见难。一回关,一回山,寻遍团团圆圆,只将红泪弹。”是为另一位南社友人陈蝶仙的小说《玉田恨史》写的,从中可管窥其文采,也可看出他与陈蝶仙之间的交谊。《陈栩园一门风雅》《十云夫人之慧婢》《定山居士顶居趣话》等都是他与陈氏一家交往的记录,陈蝶仙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老蝶,其子陈小蝶自然就是小蝶了。此外,《文艺叙餐会·狼虎会起源》《极有趣的亲友诞辰》两篇也都提及陈蝶仙,前一篇介绍了狼虎会的发起,小蝶是元老之一,老蝶知道后一定要加入,这才有了日后狼虎会的扩张。后一篇是老蝶去世百日,大家为他举行纪念聚会,会后小聚随意聊起各亲友的诞辰。

丁悚多才更重情,他一生朋友无数,经他如花之笔,南社朋友们的面目越发清晰起来。

母亲走了,走在“新冠”肆虐的日子里。

虽然,对于她的走,我们有心理准备。毕竟,已经是94岁高龄了。

母亲的一生,曾经富有,也曾贫困;曾经苦恼,也曾欢欣。因为她的乐观,在我们家最困苦的时候,用她那羸弱的身躯,撑起了一大家子的活路;因为她的坚毅,在我们家饱受磨难的时候,用她那不屈服的精神,带着我们走过了坎坷不平的路途。

杜老夫子说,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流传了一千多年。倘若一个人的寿命活到了九十四岁,应该是高寿了,很稀奇了!母亲就是一个高寿的、稀奇的人。

1959年,因为错案,父亲含冤发配。30岁出头的母亲,一个人挑起了抚养我们四个孩子的沉重担子。原来,父亲有着较高的收入,家里生活也算富足。父亲的遭遇,使得家里的生活水平一下子跌了下来,日常开销捉襟见肘。但是母亲仍旧想方设法,让我们像他人家里小孩一样,生活水准不跌。每逢过年,母亲会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,为我们每个孩子做新衣裳,虽然只是外套,让我们春节出门像像样样。

父亲在家时,每逢春节,总要上门给他在上海的舅父拜年。父亲不在了,母亲继续着。每年的正月初二(或初三),她会带领我们去到远在大统路早桥的舅公家拜年,看望老人。像父亲一样,母亲一定会叫一辆三轮车,带着我们去。记得那时车费是三毛五到四毛之间,母亲总是会拿出五毛钱,给那位师傅,说“不要找了”。

我不知道当时的母亲是怎么想的,但一定是,不想让我们遭受某些势利的眼光,她要让大家都看到,阿拉的小囡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生活。现在想想,母亲不免有些“唐·吉珂德”。

母亲之所以能够顶着这么沉重的压力,艰难地把我们抚养长大,又与她的豁达开朗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年轻时的母亲喜爱体育运动,打篮球、骑自行车,甚至直到花甲之年,逢到兴起,还会与孙辈们一起跳绳子、踢毽子。

母亲爱看戏,上海地区的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滑稽、评弹……都爱好;后来经济条件受限制了,家里的红灯收音机成了她的亲密伙伴。再后来,改革开放了,从港台地区流传过来的通俗歌曲,也成了她的喜爱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国女排崛起,母亲又成了女排的拥趸。而争抢激烈的足球比赛,也是她的所爱。她喜欢申花队,喜欢徐根宝、范志毅、吴承瑛……记得多年前,母亲突患脑梗,经医治清醒过来,开口的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,“今朝申花队赢了?”使一旁的医生也很意外。

母亲为人很是慷慨,即使我们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时候,她也不吝啬。每逢浦东乡下带来甜芦粟、珍珠米、香甜瓜等,她一定是会拿出一部分分给左邻右舍,还有天天聚在我们家里的我们四兄妹的同学们。她总是讲,钞票吃得光用得光,宁可自己少吃点,勿要太计较。大有一副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派头。

母亲的“心”大得很。她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,因为生计,也因为后来身体不好,所以除了到厂里上班、挣钱养家,四个孩子的学业她基本不管,而由我这个“老大”承担。每逢学校开“家长会”,都由我这个长兄代母出席。好在几个弟妹也比较争气,特别是“文革”期间,也是“安分守己,不越雷池一步”,使我这个哥哥也有一点“成就”感。

母亲对“吃”蛮有要求,即使到了晚年、到了她住在护理院的时候。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看她,到了护理院,第一件做的事就是,带她到护理院外面的饭店里“撮”一顿。“新冠”疫情前的三年来,那个镇上的五六家饭店早已吃了个遍。每当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我们的母亲,饭店里的服务员早就打起了招呼,“阿婆,又来了!”

母亲是浦东人,特别爱好家乡的白斩鸡;那里的鸡是散养的,吃上去香,上馆子白斩鸡是必点的。母亲爱吃大闸蟹,往年每到了吃蟹的季节,我妹妹买了在家里蒸好,趁热马上送过去。她会说胃口不好,吃不下;可是,四两、半斤一只的大闸蟹,一口气吃三只,绝对是小菜一碟。

还有一件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,每当吃完饭,她总要我们另外买四份馄饨,带回去,给同室的老人和照顾她的阿姨。即使中午卖完了,她会嘱咐我们把钱付了,让店里的服务员晚饭的时候送到护理院。

2020年春节,早已准备好的年夜饭,没能端上全家人团团圆圆的餐桌;我们儿女,还有孙儿、孙女、外孙,乃至重孙、重外孙,没能给身在东海养老护理院的母亲、奶奶、太太拜年,奶奶没能看上隔离了许久的孙辈、重孙辈,平添了些许忧伤。

早想着,2021年的春节,2022年的春节,能把前两年的缺憾补上。未曾想,为了防控的要求,护理院还是不能敞开门。

母亲走了,却带不走我们无尽的思念,您把良好的品行,坚毅的性格和豁达的做人理念留给我们,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。



今,弟弟也开始跟着姐姐的步伐讲故事,时常让我们录下来,发布给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听,还时不时关注起点击率,颇有竞争上岗的感觉。有友是大队长,弟弟说,自己也要当大队长,姐姐别三条杠,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徽章,让我们也给他别上,说这是他的三条杠。

家有二娃后,我的生活无比充实,我成了乒乓球陪练、乐高陪玩;偶尔,我也要跟着他们重温一下儿时读书的感觉;宅家期间,他们每天督促我锻炼,跳绳、仰卧起坐、毽子操、平板支撑;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那会儿,他们骑着滑板车,抢着带快递,而我则可以两手空空时,幸福感满溢。

不过,家有二娃,真的不只有幸福,更有忙碌,也需智慧。家有二娃,妈妈加油!

女儿的坚强鼓舞着我,让我更乐观从容地应对困难。

新时代 新父母 郭影

二娃妈妈的苦与乐

丛歌

的日子想得很美好,可以给妹妹打扮,我给她泼冷水:你正在脑补的是一个洋娃娃。小弟弟是我在复旦大学读研时降临的,工作加读研,本已忙忙碌碌,研二下半学期,毕业论文要

开题了,偏偏添了个丁。尚在哺乳期的我,跟导师讨饶:让我延迟毕业吧。导师的话,我至今还记得:咬咬牙、跺跺脚,是呀,咬咬牙跺跺脚,什么都能挺过去。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,白天工作,下班先回家喂奶,接着“飞车”去复旦上晚上的选修课,回到家赶紧哄娃,晚上继续挑灯夜战赶论文。有人问我:苦吗?苦!那是一定的。但,乐也是无穷的。

还记得上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,妈妈就劝我:还是要生两个小孩好,他们有个伴,家里也热闹。老二真的来了,还是个

男娃,调皮、捣蛋,能量无穷,更是个马屁精。所以要说如今生活的第一乐,那就是听小友的“花言巧语”,他会在不经意间,夸我烧菜好吃,还会装出懂事的样子,我的口袋里,时不时会多

出几颗糖。家里也由此“卷”了起来,姐姐有友做起了“田螺姑娘”,早上6点半起床,抢在我们前面,收拾厨房,烧水,准备早饭,时间充裕,她再把客厅整理一下。为了显示自己也会干家务,弟弟睡前整理起了自己的玩具,爸爸拖地时,他也在一旁帮忙。有友见状,不甘落后,口渴去厨房倒水喝时,一定会帮我泡一杯茶。这时的我,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。

有友从小爱讲故事,我们为她开了一个“有友讲绘本”的微信公众号,记录她声音的成长。弟弟听着姐姐讲的故事长大,如

还记得几个月前,疫情宅家的第一天,也是楼栋微信群建好的第一天,楼下的邻居通过群聊加了我好友,看到手机里跳出的室号,我心里惊呼:大事不妙,跟我提意见的来了。我家太吵了!我抢在友邻开口前,先表达了深深的歉意:家有俩娃,都居家,真的比较闹腾,非常抱歉。友邻是个好姑娘,连说没关系,她说,自己只是要确认下,我家是不是还在装修云云。

最近,做核酸的频次有点高,每次下楼,我家的阵仗有点厉害,倒不是人多,而是人未到,声音先到,小朋友的闹腾声,我的呵斥声……看到在大楼门口“点名”的楼组长,我也总是要抱歉声连连,不过,楼组长阿婆总是笑盈盈地对着两个小朋友说:“养得真好,小孩就应该是这样的。”转而又对我说:“生两个好,现在辛苦点,将来开心得咧”。

家有二娃,真的有说不完的苦与乐。

还记得,女儿有友曾一直盼自己能有个妹妹,她把有妹妹